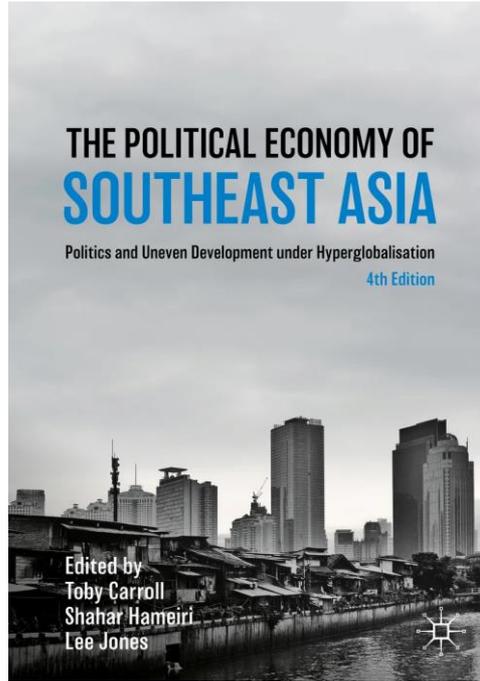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东南亚政治经济学：超级全球化下的政治与不平衡发展》（第四版）（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Politic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under Hyperglobalisation）（Fourth Edition）

编者按：如何解释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停滞与追赶困难，是当代关心全球发展的各学科学者的核心任务。然而，究竟应该从跨国研究出发总结一般化的规律、还是应该从区域国别特性出发发现特殊化的逻辑，在方法论的层面仍然远无定论。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与政治学无疑选择了前者的道路，以比较方法与跨国检验来进行有关经济发展的研究。本书则是依循后者道路的一个尝试：将政治与经济综合起来、并充分考量东南亚各个国家所存在的时间与空间背景。这一路径确有潜力补充主流的政治与经济研究，为关心东南亚的研究者带来新的洞见。

本书三位主编分别为托比·卡罗尔（Toby Carroll）、沙哈尔·哈梅里（Shahar Hameiri）与李·琼斯（Lee Jones），托比·卡罗尔时任香港城市大学副教授，沙哈尔·哈梅里系昆士兰大学教授，李·琼斯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



《亚太经济文献》(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2021 年刊载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安妮·布斯 (Anne Booth) 为本书所写的书评, 书评摘编如下:

本书是继 1997 年、2001 年和 2006 年由不同出版社出版三卷之后的又一版本。前三卷分别由加里·罗丹 (Garry Rodan)、饶伟讯 (Kevin Hewison) 和理查德·罗宾森 (Richard Robison) 主编, 他们三位如今被称作是“默道克学派”的开山祖师。这几卷书, 连同罗宾森和维迪·哈迪兹 (Vedi Hadiz) 撰写的其他几本书, 一起“挑战了有关东南亚经济发展的既有文献”(原书第 5 页), 尤其是那些由正统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写作、大致研究“比较制度”的文献。读者可以从编者的序言中了解到, 默道克学派不仅摒弃了这些方法, 还抛舍掉依附论, 以及由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查莫斯·约翰逊 (Chalmers Johnson) 和爱丽斯·阿姆斯登 (Alice Amsdem) 在日本和韩国问题上较早提出的通常被称为发展型国家的文献。这些学者用孤立的官僚机构来解释为什么日本和韩国能快速增长, 因为这些机构可以自由地实施有利于增长的政策, 不会受到既得利益者的过多干扰。与之相反, 默道克学派则强调东南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阶级力量、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强势的政治-官僚网络; 占主导地位的财团, 即通常被家族和“裙带资本家”拥有的小统治集团; 非自由且崇尚消费主义的“暴发户”和对民主不感兴趣的中产阶级; 饱受压榨但又一盘散沙的工人阶级和农民 (原书第 7 页)。

这种路径对 2020 年的东南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原因将在下文详细讨论。但毋庸置疑的是，这种路径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国家和学术环境中引起共鸣。本卷的三位主编中只有一位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工作，十九位作者中只有三位在默道克大学工作，八位来自澳大利亚以外的国家，分别在美国、英国、日本和中国香港的不同机构工作，只有一位来自东南亚（印度尼西亚）。事实上，可以说默道克学派在过去三十年里对东南亚研究的影响在澳大利亚首屈一指，或许只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可与之较高下。

在第一章中，哈梅里和琼斯讨论了东南亚政治经济理论化的方法。他们认为，政治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后者则倾向于认为政治充其量只是对市场平稳运行的侵扰。有人认为，主流经济学很少关注影响经济决策的政治力量，而许多政治学家却忽视经济力量。

默道克学派一直致力于解释东南亚的各种政治结果，对该学派来说，制度反映并巩固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力量（尤其是阶级力量）对权力的现有分配。这种分配不是通过开明和任人唯贤的官僚机构的自主政治决策或特定的历史路径来完成，而是通过植根于更广泛的国家和全球政治经济结构中不断演变的权力和资源争夺来演变和运作的（原书第 5-6 页）。

作者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特点是强调“政府退却”以支持私营企业，偏好由私营部门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贬低累进税等再分配政策。他们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分析更多是意识形态而非理论。然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组织形式。包括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主张政府在发展中国家里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尤其是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包括基础设施、卫生和教育；他们还认为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s）等干预措施可以在减贫方面发挥有益作用。将现代经济分析等同于美国茶党活跃人士的极端观点，既不准确，也无助于评估现代经济分析在帮助解决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所起的作用。

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哈梅里和琼斯指出，东北亚“发展型国家”模式在很多方面无法套用到东南亚上。在 1960 年后的几十年里，该地区一些国家未能足够快速地将教育扩展到小学之后，来满足劳动力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20 世纪 80 年代末，泰国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促使许多企业迁往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的低工资国家。即使是新加坡，也迟迟没有学习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扩大中学之后特别是科技的教育。新加坡的高科技制造业和金融业仍严重依赖外籍熟练劳工。印度尼西亚虽继承到荷兰殖民时代留下的

一点教育基础，但即使在 1970 年后政府收入增长，也迟迟没有将教育扩展到小学之后。菲律宾从美国时期继承到更为广泛的教育体系，即使在今天，其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也高于大多数东盟邻国。但菲律宾经济增长缓慢，尤其是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再加上人口增长相当快，意味着国内经济无法吸收中小学和大学系统的产出。因此，菲律宾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输出劳工，在过去 50 年里，移民劳工的数量迅速增长。

这些事实广为人知，多年来许多关于东南亚经济发展的研究都对此进行过广泛讨论，其中包括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可能更愿意自称为历史制度主义者所撰写的研究报告。在解释东南亚和其他地区千差万别的发展结果时，默道克路径和其他方法相比有什么不同？哈梅里和琼斯认为，默道克路径的关键背景是“资本主义的全球阶级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与当地不同的投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地缘政治因素之间的关系”（原书第 17 页）。他们进而认为，经济发展并不仅仅是因为技术官僚在政治压力的庇护下实施了“好政策”，还因为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包括冷战和全球化在内的一系列国际风云变化迫使东南亚国家遵循一套特定的政策。事实或许如此，至少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让世界其他地区的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但这些政策在不同地区也造成不同结果。卡罗尔在第二章中描述得很清楚，他展示出一系列有关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贫困率以及其他有关劳动力、国际贸易和税收政策指标的统计数据。其中大部分指标都直接来源于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指标虽然没有试图解释差异但是突显出整个地区的不同结果。为什么（原书图 2.1 里）泰国和越南的各种贫困指标要比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好得多？或许能从 1957 年至 1997 年这几十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较快的角度来解释泰国的优越表现，但卡罗尔并没有真正试图去解释这些数据。尽管相关数据可能存在缺陷，但越南的教育和卫生指标确实表明，对于一个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重视参与地区和全球经济的中低收入国家来说，其表现非常出色。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异？卡罗尔并没有进行讨论；相反，她强调一个事实，即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历来依靠原材料出口实现增长。出口的多样化制成品主要是中低技术产品，通常由外企制造，如果当地条件（包括工资水平）发生变化，这些工厂可以重新选址。东南亚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新加坡也没有效仿中国台湾地区或韩国发展本国的冠军企业。1969 年至 2019 年期间，新加坡取得辉煌发展，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也实现五十年的稳健增长，现代或三星在该地区已销声匿迹。日本、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公司利用廉价劳动力在东南亚各地生产零部件和组装产品，却在本土或其他发达经济体开发新产品。

多年来这些问题都被反复讨论，但卡罗尔并没有详细介绍相关研究成果，也许是因为这些工作并不总是符合所谓的“默道克路径”。有几项研究将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教育政策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教育政策进行比较，指出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教育超前于需求，而东南亚国家对小学后教育投资不足。如果按“默道克”的逻辑来解释，或许因为这些地区的许多政府都由强势寡头主导，累进税制不利于维持他们的利益。因此，无法调动国内收入意味着政府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资源有限，而且往往只有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才能提供最佳服务。然而，教育改革已经开始，近几十年来，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的劳动学历不分男女都有了迅速提高。这些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与家庭小型化以及家庭投资子女教育的意愿有关？卡罗尔或其他作者都没有直接论述人口变化与人力资源开发之间的复杂关系。索引中找不到有关教育、健康或人口的参考资料。

默道克学派热衷于关注大型企业集团的发展，这些企业集团依托统治家族的裙带关系发展壮大起来，它们对在中高技术领域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兴趣不大。总体来说，他们认为尽管该地区发生过各种政权变革，但东南亚国家仍然由权力集中且狭隘的精英主导决策，实行寡头统治（罗丹和贝克，原书第 91-92 页）。他们认为，虽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些国家发生了变化，但寡头仍设法重组并利用其财政和政治力量维持甚至扩大对权力杠杆的控制。在实施重大地方分权（decentralisation）措施的地方（主要是印度尼西亚），为腐败和个人瞻徇（patronage）提供新途径来使各寡头集团受益。罗丹和贝克（原书第 88 页）虽然承认该地区许多地方的经济增长造就出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其消费模式与高收入国家相差无几，但他们认为，这一新阶级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国家，缺乏挑战寡头权力的意愿和能力，即使东南亚寡头面临着非政府组织等新社会力量的挑战。

罗丹和贝克没有提供太多证据来支持他们关于中产阶级依赖国家的论点。卡罗尔提供的一些数据却佐证另一种观点，即该地区一些国家的中央政府相当软弱，而且在过去二十年里可能变得更软弱。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支出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而印度尼西亚的政府支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国家的依赖性并没那么显而易见；相反，最近的研究表明，许多中产阶级在私营部门从事专业、技术和行政工作。虽然一些大型私营企业集团可能与某些强势政治人物有联系，并在签订合同时依靠他们获得优惠待遇，但其雇员只占中产阶级的一小部分。

在关于东南亚民粹主义的章节中，罗宾森和哈迪兹认为，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他信（Thaksin）和杜特尔特（Duterte）等政治家都通过实施旨在改善贫困群体健康和社会福利的计划，以及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来寻求民望。在泰国，他信的民粹主义改革不受曼谷精英待见，最终被支持军队和君主制的保守联盟推翻，不过他的一些政策在后来的政府中延续下来。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尽管收入和财富的差距仍然很大，但经济逐步增长加上社会福利政策似乎使贫困率在近几年有所下降。罗宾森和哈迪兹却指出，这两个国家尚未出现致力于进一步改革社会和经济的“真正社会民主”政党，因此杜特尔特和佐科的政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义经济项目经常引发的混乱和动荡”影响（原书第 171 页）。

本卷其他大部分章节都围绕着这样一个主题：因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部分人口被迫背井离乡，社会不平等加剧，旧的确信性和社区被破坏，男女都被迫从事新的工作形式，这些工作形式往往既不稳定又令人讨厌，从而引发越来越强烈的社会不满。换言之，新自由主义政策只关注经济增长，忽视了国家和国际层面强大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确保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利益归于自己和盟友，使得大部分人口被边缘化，陷入贫困。政府和政治家被视为这些利益集团的傀儡，既无能力也无意愿为更广泛的国家利益采取行动。

虽然这种分析方法能纠正某些经济学家武断的“水涨必能船高”的结论，但它本身也存在在问题。本卷中的大多数作者似乎都认为，在东南亚不可能实施有意义的经济改革，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进步十分缓慢，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根本不存在。诸如减少收入贫困、提高识字率、降低婴儿和儿童死亡率、通过改善交通设施提高流动性、农村电气化以及改善住房质量等成就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轻描淡写。虽然海切尔（Hatcher）、赫希（Hirsch）和盖勒特（Gellert）在第四部分详细讨论了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许多问题，包括环境退化和土地转让（land alienation），但相对于有关这些问题的大量文献，默道克路径并没有明显地填补多少空白。赫希在其关于土地和农业关系的章节中深思熟虑后得出结论：抵抗小农生计所受压迫并不明显地受阶级话语塑造，而更多地被以环境、地方主义、种族和其他类别为框架的议程影响。然而，阶级、权力和社会冲突依旧是农业政治经济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对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控制仍然是农业结构和进程的基本决定因素。与这些基本政治经济结构和进程交加的是全球化力量、经济一体化的区域表现形式，不断演变政治形式和农村人口对这些政治形式做出反应的同时也在塑造这些政治形式（原书第 360 页）。

鉴于本卷的大多数作者都同意赫希的观点，即阶级、权力和社会冲突是东南亚发展成果的重要决定因素，竟没有一位作者真正探讨这些术语在当代东南亚社会中的含义。大多数作

者似乎都认可，中产阶级在该地区的任何地方都在增长，但对于如何界定中产阶级却没有提供任何指导。三十年前，拥有一辆摩托车或一部手提电话可能就足以将某人归为中产阶级；但到 2020 年，绝大多数人都能拥有这些产品。再者即使中产阶级不断壮大，这对未来的冲突又有什么影响呢？如果说阶级冲突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为什么东南亚最近发生的许多冲突似乎都是宗教和种族对立造成的呢？在研究亚洲经济变革因果时，阶级（无论如何定义）果真是一个有用的概念吗？也许作者们会在今后的著作中探讨这些问题。

（原文为开放获取，可见：Booth, A. (202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 Politics and Uneven Development under Hyperglobalisation* (Fourth Edition) - edited by Toby Carroll, Shahar Hameiri and Lee Jones (ed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 Pp. xxvi + 412, ISBN 978-3-030-28254-7, 978-3-030-28255-4 (ebook) . Asia Pac Econ Lit, 35: 153-157. <https://doi.org/10.1111/apel.12322>)

策划、校对：秦北辰

编译：杜薇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